

中国重返富国之列路还很长

北京大学教授 傅军

人类历史自出现国家以来,就伴随着大国的兴衰更替。追溯历史,如果用人均GDP来衡量,700年前的中国是地球上最富最发达的国家。大约在公元1000年,中国人改进了磁罗盘并用于航海;公元1045年,中国人毕昇开始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开封是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在宋代,这里是首都,有上百万的人口,相之下,伦敦仅有1万5千人。

为什么辉煌如过眼烟云?为什么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没能保持领先者的优势,反而被欧洲国家赶上,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在200年前开始越拉越大?虽然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从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就为国家的复兴付出不懈的努力,为什么他们以失败告终,而只是到了共和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开始收敛?

今天全球都在关注,这种收敛的势头能否持续?中国人能否重返富国之列?

研究显示,在19世纪早期,中国GDP的总量大约占世界的30%,到了20世纪初,该比例迅速跌到13%,到了30年前改革开放的前夕,甚至还不到5%。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又回升到大约

15%。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以GDP总量衡量的中国经济业绩主要是由于众多的人口(目前是13.2亿)。中国人口在19世纪初是世界的1/3,20世纪初是1/4,现在大约是1/5以下。然而就人均GDP而言,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以下。可见,即便是与自己的历史地位相比,中国还有相当的距离。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2006年,世界GDP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美国(13.8万亿美元)、日本(4.3万亿美元)和德国(6.3万亿美元)。中国以3.2万亿美元超过英国的2.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然而,中国GDP总量后面掩盖了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巨大贫富鸿沟。因此,当人们在前进道路上庆祝胜利的时候,同时也必须看到所面临的挑战。这种趋势如不扭转,则意味着扩大内需的良好愿望多半只能是愿望而已。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有过一句诙谐但意义深远的話:“生产什么都不是,但是从长期看它几乎什么都不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指出:“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反映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才是财富增长真正源泉。”

如果说提高人均收入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么人为扭曲的收入差距将使经济雪上加霜。因为消费的不足最终会制约经济增长。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醒过人们:牛奶倒在海里只是危机的表象,深层的原因是劳工的贫困,不论是在绝对还是相对的意义。这是逻辑推理的使然。在经验世界中,如果人们暂时看不到供应过剩的表象,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的解释是:市场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外,如果还有国际市场的话。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核心所在。借助他们的逻辑,可以推出什么?就中国经济的目前重出口轻消费的结构而言,内需不足的深层原因是劳工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其生产力增长的速度不匹配,这时如果国际市场出现紧缩,中国经济势必加剧供大于求的矛盾。目前中国出口占GDP比重已从2001年的20%迅速增长到今天的40%以上。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一个教训是,虽然国际市场是存在的,但是部分是被虚拟的“财富效应”夸大了。尤其对转型经济的大国而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内需的重要性凸显,必须警惕国家资本主义幽灵

的出现。13亿人的市场内需不足的深层原因是,在工业化大潮中,几亿农民工及其他人的家属在创造了巨大产出之后,他们自己却未能获得与工业化进程相匹配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未能转化成城市居民,产生有效需求。在人均GDP达3千美元阶段,世界平均城市化率是55%;而中国目前只刚过1/3。根据克鲁格曼的计算,中国目前依然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人平均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4%,与1975年的韩国类似,即使墨西哥产业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

可见,在致富的马拉松赛跑上,让中国民众进入世界上富国之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跑,我们还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在国际层面理顺国内外市场,在国家层面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反垄断以及在企业层面增强公司的自主能力。如果说,制度安排或是利益的冲突或是利益的妥协,前者为恶性,后者为良性,那么从长远计,上述问题的最终出路,或者说是更有效的方法,不是个人的愿望,而是切实进行以人为本、权力和利益合理制衡的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安排才是实现良好愿望的可靠的保障。(摘自FT中文网)

如何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

澳大利亚 孔保罗

自从就业成为问题以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专家、学者乃至政府都一直将它作为一个类似洪水猛兽一样的问题来看,而且都一直是试图彻底杜绝失业,而不是利用它来解决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困境。在解决社会政治与经济困境方面,人们的基本做法也是如此。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是用就业问题做杠杆来化解其它社会问题的。中国也不例外。以拉动内需为例,经济学家始终在加大政府投资和鼓励人们以当前的储蓄来消费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注意新的思路。令人扼腕的是,尽管失业、拉动内需、社会保障建设都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经济学家还是鲜有新的思维。

我们是否应该有新的思维?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我们可以更为直率地问,我们可否用就业问题来拉动内需?可否以相对资金过剩来化解就业问题?可否利用就业问题使我们在无需政府投资的前提下就建立起一套更为有效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乃至政府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在传统的理论和模式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除了突破传统的限制,我们已经没有其它的选择。

一提到贷款,就有一些人感到担心,因为现在大学生助学贷款出现了许多赖账现象。一些学者也表现出类似的想法。他们甚至断言,在中国没有建立起类似西方社会的信用体系之前,不可能实施这种贷款。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如果是一个学者,尤其是一个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在没有对西方国家的信用体系和大学生赖账之前就做出这种推论,是极其武断的、极其不严肃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实际上在西方社会虽然有信用体系,可是赖账的现象也不少。另一方面,即使没有西方的所谓信用体系,我们也可以利用当前的社会问题——社会保障的困境——来建立起一套安全体系,彻底化解贷款给失业者和大学生所造成的呆账和坏账风险。

社会保障问题的症结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社会保障都遭遇着巨大的困境,即缺少资金。虽然社会保障的开支已经接近GDP的30%左右,可是与需要相比较,还是少得可怜。尤其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资金消耗的知识洞,因此究竟缺少多少资金,实际上根本无法计算。西方知识分子惊呼,社会保障的危机是一个超级次贷危机。遗憾的是,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还在东施效颦,盲目地沿袭西方社会保障的模式。而在中国,社会保障的建设同样也面临着严重的资金匮乏问题。由于资金缺乏,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保障非常薄弱。需要指出的是,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根本无法彻底解决社会保障的资金短缺问题,因为这种资金的短缺是由于西方社会保障的基本模式造成的——迄今为止的西方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由部分社会成员的部分当前收入来救济整个社会的全部成员,而救济是没有底线的,是一个资金消耗的无底洞。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在构建的初期就需要海量的资金,在建立起来之后也是需要巨大而无限的资金来维持的。

社会就业贷款保障

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预支工资给失业者和大学生,可以从根本上化解社会保障体系的困境。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就无需再对大学生及其失业者实施社会救济保障,而只需要对其中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士实施社会救济保障(根据联合国的伤残人士统计标准,这种人不会超过人口的5%),因此社会保障体系就可以节约巨大的经费。而且获得社会就业贷款、预支工资的大学生和失业者越多,则社会保障体系节约的费用就越大。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由一个强制性的收费体系和一个责任性的付费体系组成的系统。这两个系统都可以也必然覆盖每一个社会成员,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赖掉社会保障的债务。而且如果发生赖账情况,社会保障也不会吃亏,因为赖掉社会保障债实际上也就是赖掉了自己的社会保障。所以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就是一个资金周转的安全保障平台。在这一平台上贷款给大学生和失业者,不会产生任何呆账和坏账所导致的问题。

所以,只要对贷款给大学生和失业者的模式进行改革,使之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平台上实施,则呆账和赖账问题都可以得到完美解决——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和失业者,并不会产生呆账和赖账问题。尤其重要的是,社会就业贷款保障及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和失业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保障。所以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和预支工资给大学生,也就是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

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

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预支未来的工资,必定会导致人类社会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它将可以使中国在无需政府投资的情况下,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范围、标准都远远超过目前西方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它又可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一方面极大地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则可以非常安全地消化中国金融体系目前的数十万亿相对过剩资金。此外,它还会使家庭收入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大学生从已进入大学就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因此大学生从进入大学开始实际上就进入了就业状态。这可以使家庭经济收入与支出的结构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大学生读大学也就是就业的开始,因此大学生无需父母的支撑,这可以使父母的负担大大减轻;同时大学生的工资收入还可以反过来帮助家庭,因为大学生所预支的是未来的工资,而不是生活津贴,这种工资完全可以维持他们的正常生活。这对于经济相对拮据的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家庭。我们甚至于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样说: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将会立即改变部分农民家庭的经济情况。

此外,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预支工资给失业者,还会使人们再也无需担心失业,因为失业也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这对于雇主关系的调整、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还需要指出的是:实施社会就业贷款保障,预支未来的工资给大学生和失业者,实际上就是让人们以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未来收入不足以自我保障者,则可以获得比现在在西方社会保障更为全面和高标准的救济保障,因此它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基本社会公平原则——各取所需和各尽所能。所以它必将导致人类社会的一次空前伟大的进步。对中国社会而言,更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里程碑。

美国经济前景正反观

东方证券周伟 冯玉明

雷曼破产引发全面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首次作出谨慎而乐观的表述,认为经济衰退结束在望。

根据Bloomberg经济预测数据显示,各机构对于三季度美国经济环比回正,触底回升的预期正在增强,三季度美国GDP环比增幅的平均预测值达到2.2%,少数较高的预测达到了3-4%之间。支撑伯南克谨慎乐观表述以及各机构上调经济增长预期的背后因素是近期经济数据的积极表现,领先指数、新屋开工、零售销售以及工业产出与产能利用率数据的恢复似乎让人们看到了经济走出衰退触底回升的曙光。

8月美国新屋开工量环比递增1.5%,年化为59.8万套,达到9个月以来高点,较4月份的最低点已回升近25%。当月独栋住宅开工量在连续5个月的增长后首次出现环比3%的回调,而公寓住宅开工量环比递增25.3%弥补了独栋住宅开工量下降的缺口。新屋开工许可当月环比递增2.7%,年化为57.9万套。另外FHFA房价指数连续第三个环比小幅递增。

美国8月份零售销售额环比递增

2.7%,是2006年1月以来最大单月增幅,远超前市场预期的1.9%。其中最主要的拉动因素就是政府的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汽车销售环比递增11.9%。扣除汽车销售激增因素,零售环比递增1.1%。8月零售数据带有较大的特殊性,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至8月25日已经结束,政府补贴拉动内需的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时与去年同期相比同比仍有5.3%的降幅。8月是传统返校消费旺季,并未给零售商带来惊喜,从而也部分打击了零售业对于圣诞消费的预期,预计美国内需的整体走势仍将维持低迷,消费需求仍将保持谨慎。

8月份美国领先指数连续第5个月环比回升,一致指数和滞后指数在保持低位稳定。当月推动领先指数上行的主要因素有长短期息差扩大、供应商供货周期短、股票市场持续上扬、新屋开工许可递增以及消费者预期指数改善,同时M2货币供应和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仍然成为负面因素。

积极因素中,长短期息差扩大和股市上扬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长短期息差扩大被视为投资者长期出借资金意愿回升,部

分投资者重新愿意承受长期投资风险显示出对未来经济复苏前景的信心。一般认为领先指数预示未来3-6个月的经济走势,由目前领先指数的趋势市场可以得出对第四季度以及明年一季度的较乐观预期。

美国三大股指自3月以来强劲回升,虽然市场始终存在需要调整的预期,但上行的趋势仍然延续,推动上升的主要功能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分析。宏观层面是对经济复苏信心的不断增强、风险意愿回升以及基准利率降至历史低位等几方面因素的反映;而微观层面主要是受企业盈利好转预期的拉动。

需要指出,如果单从美国本土企业的盈利能力来看,今年二季度盈利回升力度明显小于一季度,并且金融企业的上半年的盈利恢复明显强于非金融企业,而结合我们此前对主要金融机构上两季度财报的分析可以看到,金融企业盈利回升背后有很强的政府扶持因素,非金融企业盈利回升相对显得有些乏力。企业盈利回升将成为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并支撑资本市场保持活跃的重要基础,但同时也将对几方面的负面因素影响:

G20峰会:全球领导人面临新挑战

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

本周,当20国集团(G20)领导人在匹兹堡聚首——这是他们一年内的第三次会面,全球经济恢复了增长,股市已收复大部分失地,有关萧条即将来临的传闻也已销声匿迹。如果与会者认为自己已经受住了考验,是情有可原的。

市场人气和经济数据均有所改善,但决策者远未感觉到欢欣鼓舞,过去一年的经历和避免危机重演的愿望,让他们变得更为冷静。他们也清楚,一个出人意料的阳光灿烂的经济春天,不能保证一个火热夏天的来临,更遑论未来几年的风调雨顺。

此次峰会与今年4月份的伦敦峰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各国领导人满足于大摆姿态,想方设法地要把规模大得不可思议的资金用于应对危机。如今,20国集团的关注焦点变成了如何清理乱局以及坎坷不平的预防危机的过程。该组织实际上已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全球经济决策论坛。当时,各国团结一致;而如今,各国又再规划自己的道路。统一行动的难度将加大,在有些方面,必要性也将有所减弱。

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恢复增长。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德国和日本经济开始扩张。银行信贷和基础设施支出的飙升,将中国年度增长率推升至7.9%。上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美国的衰退

很可能已经结束;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则宣布:“有迹象表明,第三季度(英国)经济已恢复增长。”这些积极的迹象,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得出这样的结论:“全球经济似乎正最终从我们所经历过最严重的经济低迷中复苏。”这表明,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情况有了巨大的改善。信心的崩溃得到了阻止,一种正常的心态正取代恐慌。然而,尽管全球经济正从上世纪9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首次萎缩中复苏,决策者决不能放松警惕。

首先,增长的恢复尚未蔓延至最贫穷的地区,这些国家和人民与此次危机的根源毫无瓜葛,却遭受到了与其它地区同样严重的影响。IMF预测,低收入国家今年的表现,将不及3月份时该机构预期的水平,因为贸易、汇款、外资以及援助都低于预期。世界银行估计,此次危机又把9000万人推入了“极度贫困”状态,每天的收入不足1.25美元。

甚至在一些大型发达国家,挑战也几乎同样严峻。尽管衰退已经结束,但几乎没有预测者认为,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足以减少失业的程度。迄今为止,全球增长仍依赖于财政刺激以及企业补充枯竭的产品库存,而非活跃的私人消费或投资。

一些财政注资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和德国的“旧车换新车”计划已经终止;英国正准备在岁末年初之际,将财政刺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减少1%。这些措施都可能使暂时支出从经济中退出,从而中经济复苏。但最让决策者担心的,是阻碍健康复苏的一个较长期障碍。在经济危机中,政府预算一直首当其冲,因为税收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而公共支出却不断上升,以限制经济衰退造成的损害。

到2010年,预计G20各国的政府赤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从危机前的1.1%飙升至6.9%。IMF预测,G20发达成员国债务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从2007年的不到80%,升至2010年的110%,这引来了这样的担心:即全球储蓄将被用于保障政府的偿付能力,而不是为新的生产性投资提供融资。

综上所述,这些因素让经济学家无可置疑地认为:丧失的大部分产出和就业并非仅仅暂时闲置,它们将永久地丧失。失业人员的技能将出现退化,一些本来能够存活下来的公司已经破产,资本——厂房、机器和建筑——将被废弃。

弄清楚有多少产出永久性丧失的难度很大,这这对决策者构成了一个可怕的挑战。他们应如何下令取消非常规的金融干预,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他

们又该何时开始?

G20财长本月已达成一致意见,将维持扩张性的政策“直至出现可靠的复苏”——但他们未能解释持久性复苏的定义。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明白,过早行动可能会令本国经济重新陷入衰退。但如果让宽松政策持续过长时间,发生另一种灾难的风险将会上升。银行可能会对它们目前享受到的大量政府担保产生依赖,再次承担过度的风险。遭受打击的公共财政状况,可能会令债券市场感到不安,以至于他们把借钱给政府视为一项绝对的高风险业务,并为此收取高得多的费用。如果家庭对政府管理资金的做法丧失信心,通胀有可能会再度抬头。

作为整体,他们意识到,全球经济很容易就会退回到严重贸易失衡的模式——美国和英国在消费和借贷,而与之对应的,是日本、德国、中国以及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国在生产 and 储蓄。不过,与过去10年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美英两国将是公共部门在举债,而非家庭为进行消费而借贷。

当以次贷形式借给美国私营部门的新贷款状况恶化,全球贸易失衡模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同样,与日俱增的财政赤字也无法维系长久的复苏。

(摘自www.ftchinese.com)